

关学传人孙景烈及其学术成就

王雪玲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孙景烈是关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之一,其一生不尚浮华,不务虚名,以书院为阵地,以讲学著书为手段,以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致力于陕西人才的培养和关学的发扬光大。讲学之余,孙景烈又整理出版家乡先贤康海的著作,纂修郃阳、郃县、武功等县地方志书,在宣传陕西学人、宏扬家乡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关学;孙景烈;书院;游幕;舆地;方志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20-06

孙景烈(1706~1782)字孟扬,号酉峰,陕西武功人,雍正十三年(1735)考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出任商州学正,乾隆四年(1739)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升检讨,次年“会大考,不及格,以原官休致”^①。孙景烈为人耿直,一生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先后主讲关中、兰山、明道等书院,撰有《易经管窥》、《诗经讲义》、《四书讲义》、《性理讲义》、《关中书院课解》、《西麓山房存稿》、《滋树堂文集》等著作,又先后修纂《乾隆郃阳县志》、《乾隆郃县新志》以及《郃封闻见录》,整理出版康海的《对山集》和《武功县志》,为昌明关学、宏扬陕西文化做出了贡献,是关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之一。目前关学研究成果斐然,但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张载、冯从吾、李颀等大家身上,至于孙景烈,由于其本人著述难以窥见,史料记载又极其有限,因此相关研究鲜见论及,本文拟在梳理孙景烈生平的基础上,总结其学术成就及贡献,敬请方家指正。

一、献身教育

孙景烈仕途短暂,几无可言之处,一生“惟以讲

学为事”^②。孙景烈入翰林院就职前曾任陕西商州学正,致仕归乡后,则以讲经授徒,著书立说为已任,正如其所言:“景烈自回籍后,以舌耕为业,与作诸生时无异也。”^③时人亦谓孙景烈致仕归乡后,“与学者日讲性命之学,凡三主关中书院,一主兰山书院,一主郃县明道书院,家居授徒又三十余年。自致仕学日益粹,名亦日益高”^④。

(一) 执教商州

雍正十三年(1735),孙景烈出任商州学正,期

① 徐世昌编,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206《孙先生景烈》。按:《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90“乾隆八年”载乾隆帝于正大光明殿阅大考试卷,“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孙景烈等七十一人被定为四等,“俱著休致”,“其四等未经降调休致者均罚俸一年,以示彰瘅”。然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3谓“以言事忤旨,放归;深自韬晦”。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亦作“以言事忤旨放归”。《清史列传》卷67《儒林传·孙景烈》言“以言事放归”。《清史稿》卷480《孙景烈传》亦曰“以言事放归”。

②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2《酉峰孙先生》,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9页。

③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复崔虞村先生书》,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④ 李元春《桐阁先生文钞》卷10《检讨孙酉峰先生墓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8页。

收稿日期:2015-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S016)

作者简介:王雪玲(1965-),女,陕西泾阳人,教授,历史学博士。

间“勤于课士,不受诸生一钱”^①,颇得时人好评。孙景烈的弟子张洲在总结其师任商州学正期间的所作所为时说:“先生为商州学正,廉以持己,勤以教士,月课弟子员,无故不至者必加惩戒,至者具饮食以待,为讲明义理,训戒开示之,商州人士,竞相劝勉,兴于学,皆以为耳目所闻见,数十年广文官无有如孙先生者,人人称颂之,至今不忘先生。每曰:教官为学校所由兴废,而人固冗视之,而居是官者亦遂莫能自振奋,举其职,此甚非也。故其所以为商州者有异于人。”^②

劝学课士之外,孙景烈在任商州学正期间还做了两件值得称道的事。一是革陋规。孙景烈初到商州,学生前来拜见,无论是否带礼物,他都以礼待之,有的学生因未带礼物而致歉,孙景烈则安慰说:“我为诸生时亦如是也。”当时商州州学有诸生丁忧递呈时“各与学师送制钱一二百文不等”的风气,孙景烈认为这是“乘人之丧而取财”的陈规陋俗,“不可一日留者”,于是起草了《革商州儒学诸生丁忧陋规揭示》,规定以后凡文武诸生丁忧,“但令亲属抱呈投递,并取里邻户首甘结,除匿丧假冒违碍等弊,例宜查究外,如有玩法书役,诈称从前陋规需索者,许递呈亲属,即赴学禀明,以凭究处”^③。此外,当时商州州学教授过生日,“诸生皆送祝仪”,孙景烈说自己二十七岁丧母,“常抱风木之悲,生辰从不置酒,亦不见客,祝仪从何而来?”认为这是非道非义之物,不得受之丝毫,并亲自拒绝了一些学生的贺礼。二是倡社学。孙景烈认为作为基础教育的社学是实现崇儒重道、教化百姓的关键,地方政府应当视之为头等大事,之前商州城内有四座社学,各乡社学则设在寺庙中,孙景烈认为这是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的遗规,应当恢复,于是起草《商州学正议复本州社学牒》呈知州,建议恢复商州城内及各乡社学,为书院输送人才,“以书院育英才,而以社学正蒙养,不患人文之不盛也”。不仅如此,孙景烈还就社学运行及教学内容阐明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堂台择诸生品端学优,或现为约正而长于文者,延为社师,优以礼貌,命各社附近诸童,肄业其中。先授朱子小学以端其本,次授四子书,各治一经,各读一史,能兼诸经诸史者,随材授之。每年四季,堂台发题各社,课试诸童优劣。优等给以笔墨,尤异者拔入书院。某社人文盛者,即将某社师奖励,或给之匾,或值文宗岁试日,准举优生。若怠于训诲者,即请退师席。嗣后乡饮介宾,未为社师及约正者,不准滥

举。此又奖励社师之一端也。至诸童所学时艺,务步趋大家,一切俗套,勿令入目。其余诗古文,亦须博览讲明,每课兼试一道,而经史外,宋五子《近思录》更为身心切要之书,宜熟观而勉学焉。如此本末兼修,教立于社学,而详于书院,庶乎人才蔚然,有造有德,出为良吏,处为真儒,薪尽而火传,所谓化民成俗,以佐圣天子久道之治者在是,不但文风蒸蒸日上,科第蝉联而已也。”^④

具体而详尽,切实而可行,效果不日可见。此外,孙景烈还撰有《商州丁祭牒呈本州三条》、《商州丁祭复本州牒》,对商州儒学举行祭孔之礼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主讲书院

孙景烈致仕归乡后,应各地官员的聘请,“先后主讲兰山、明道、关中诸书院,而关中书院为最久”^⑤。

孙景烈曾先后三次主讲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关中书院。乾隆八年(1743),孙景烈来到西安主讲关中书院,十年(1745)三月,“因陈榕门抚军会讲,语涉嫌疑,即日辞归”。乾隆十二年(1747)冬,陕西巡抚徐杞因公至武功,聘请孙景烈再掌关中书院,孙景烈不得已而应之,次年徐杞被召回京候旨,陈宏谋接任陕西巡抚,孙景烈亦辞归。乾隆十三年(1748),陈宏谋写信给孙景烈,邀其主讲关中书院,“旧日嫌疑,彼此冰释”^⑥。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孙景烈归乡省亲,偶感风寒,患上腿疾,于是派儿子赴西安辞馆,并将书篋带回,“而当事者雅意延之,随复勉力到馆”,至年底解馆时,又“以母老不便再主讲席为辞”。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当事者复延之至再”,孙景烈以母亲年逾古稀,“不敢远游,亦不敢近游”力辞^⑦。孙景烈主讲关中书院期间,著有《关中书院课解》、《关中书院讲义》,同时还制定了《关

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孙景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页。

② 张洲《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孙先生景烈行状》,载钱仪吉、缪荃孙等撰《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③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革商州儒学诸生丁忧陋规揭示》,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80页。

④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商州学正议复本州社学牒》,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81-182页。

⑤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2《西峰孙先生》,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9页。

⑥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复崔虞村先生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04页。

⑦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复陈榕门先生书(戊寅)》,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08页。

中书院学约》,按照“学之本末轻重”安排学习内容,并做如下三条规定:

“一、功课必用册记,每日分早中晚三时,各时所读所看之收,据实填定起止,以备不时查阅。如有怠于填写,及虚写而未曾用功者,一经查出,即送监院戒敕。

二、讲书之期定于三、六、九日,诸生于前两日各将所讲之书,细心体验,每适讲期,早饭后斋集讲堂,修掌教出,诸生向上打三躬,分左右坐。听掌教讲说,或命诸生面讲,或制签轮讲,务求明辨。如有素未用功,临时不能发挥者,罚站立听讲。

三、课期定于每有初三、十八日,首出四书题一道,次题或经或策论类间出。三题或赞或铭等类间出。每逢课日,诸生黎盥洗毕,自置桌凳于讲堂两旁,候题会课,务尽一日之长,申刻交卷,迟者文是佳不录。”^①

孙景烈在主讲关中书院的间隙,还曾主讲兰州兰山书院。据孙景烈自述其掌兰山书院时,“值榕门先生前辈调抚湖南”^②,乾隆二十年(1755)陈宏谋自陕西移任湖南,同年孙景烈在给陈宏谋的书信中亦写道:“金城送别后,光阴驶流,岁月又欲更新矣。晚拟于腊之六日起程归籍,明春不能再赴兰山讲席,实缘家慈年近七旬,晨昏定省,岂敢常令子弟代之。”又曰:“书院诸生,近有五十余人,颇知向上,课艺亦渐有进机,但晚学问空疏,半载内不能大为启迪,以副先生千里延师,为国作人之盛意,是可愧耳。”^③可知孙景烈主讲兰山书院在乾隆二十年,为时仅半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心系书院,关心学子课艺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明道书院系乾隆三十四年(1769)郿县知县舒其绅购买民宅而创建,创立之初因“膏火无资”没有运行,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汪以诚来任是邑,始与乡绅谋划并筹集膏火之资。同年,聘请孙景烈主讲明道书院。孙景烈主讲明道书院期间,制定了《明道书院举业课程》,对于早课、午课、午后及灯下的学习时间及内容做了详细规定,并要求“逐日据实登记在册,起止分明,阅五日呈院长考查”。每月初二、十七写作文,“四书题一道、诗古文题一道”,学生拿到作文题后,“禁应酬,禁观书,禁抄袭,务尽一日之长,酉刻即交手册,不行燃烛”^④。此外,孙景烈还应诸生之请撰写《明道书院后记》,详述明道书院的创办经过,肯定舒其绅、汪以诚等地方官员兴办书院的功绩。

二、昌明关学

关学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且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流派,始创于张载,流行于关中地区,自北宋至清末,延续了八百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⑤明、清两代关中地区出现了许多关学的追随者和传播者,吕柟、韩邦奇、马理、杨爵、冯从吾、王徵、李颀、李因笃、李柏、王杰、王鼎、贺瑞麟、刘光蕡、宋伯鲁、牛兆濂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孙景烈亦是其中的一员。《清史稿·儒林传》在总结清代关学时说:“关学初以马嗣焜嗣冯从吾,而(白)允彩、(党)湛、(王)化泰皆有名于时。武功冯云程、康赐吕、张承烈,同州李士滨、张珥,朝邑王建常、关独可,咸宁罗魁,韩城程良受,蒲城甯维垣,邠州王吉相,淳化宋振麟,皆笃志励学,得知行合一之旨。至乾隆间,武功孙景烈亦能接关中学者之传。”^⑥

第一,孙景烈继承了关学学者世代恪守的“躬行礼教为本”之宗旨,宣扬朱子之学,主张明体适用。王心敬谓其“教人专心小学、四子书。讲四子书,又恪守考亭注,而析理之细,直穷牛毛茧丝,多发人所未发。”^⑦《清史列传》总结其关学思想如下:

“其为学恪守朱子,而以《四书集注》为主,诸经子史,悉荟萃印证。以此讲学,亦体之以持身涉世。其讲《大学》格致,谓陆王之说,混穷理于去私;讲《中庸》天命之谓性,谓天命善,不命恶;讲《四勿》章复礼,谓礼即为国以礼之礼。尝举真西山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为青紫而明经,为科举而业文,去圣人之旨远矣。’”^⑧

①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关中书院学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86-187页。

②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与陈榕门先生论黄石斋九种经传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07页。

③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与陈榕门先生书(乙亥)》,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06页。

④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明道书院举业课程》,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第187-188页。

⑤ 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6《文录三·答南元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236页。

⑥ 赵尔巽《清史稿》卷480《儒林传·王化泰》,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26-13127页。

⑦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2,(明)冯从吾《关学编》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页。

⑧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7《儒林传·孙景烈》,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82页。

《清儒学案》则谓孙景烈为学“以求仁为要领,以主敬为工夫,以《小学》一书为入德之基,期为切实尽里。……其诲人汲汲孜孜,合经义治事为一”^①。弟子王巡泰谓其“务实不务名,务真修实践,不尚标榜浮华邻于虚车轮轳之饰”^②。凡此说明孙景烈在发扬关学知行合一、不尚空谈、求实致用等方面比其他关学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任商州学正时,孙景烈就特别关注现实,革陋俗,倡社学,致力于社会风气的改良。乾隆十五年(1750),陕西永寿县知县王居正写信给孙景烈,言及永寿百姓近有刁悍之名,孙景烈认为一地风气之好坏关键在于地方官的所作所为,“官不贪则民敬,官不酷则民亲,官明且断则民莫不服。刁悍之辈,何自而生”?同时,孙景烈认为士乃四民之首,是百姓效仿学习的样板,而士风不好,士习不端,关键在于学校教育没有做好,“今欲培养人才,必令生童各奉朱子所辑小学为根柢,文风俟其自变,若急急于文,道之以浮华,则士习愈坏,士习坏则刁悍之民效尤而作矣”^③。孙景烈的弟子张宝树谓其“与亲族朋友往来赠答,每不屑为周旋世故之词,间有不得已而为文者,亦皆勉学敦品,崇实黜华,盖又醇乎其醇矣”^④。

第二,孙景烈作为关学传人,与其他学者一样,亦将书院作为传播关学的重要阵地,藉以昌明关学,培养人才。孙景烈先后三次主讲关中书院,又曾主讲甘肃兰山书院、鄂县明道书院,关中学子受业孙景烈门下者不计其数。大荔李法、武威孙甫、吴保贾天禄、洛南蒋宁廷、武功张洲、韩城王杰均出其门下,人称“关中书院六士”。其中王杰,字伟人,韩城人,“初从武功孙景烈游,讲濂、洛、关、闽之学;及见(陈)宏谋,学益进,自谓生平行已居官得力于此”。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系清朝开国以来陕西省第一名状元,官至内阁大学士、左都御史,为官忠贞亮直,持守刚正,“历事两朝,以忠直结主知”^⑤。王杰擅长书法,擅长诗文,撰有《惺园易说》、《葆醇阁集》等著作。张洲,字莱峰,武功人,曾在关中书院求学,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历任广西修仁、浙江德清县知县,清介廉明,人人称颂,著有《对雪亭文集》、《诗集》、《论语讲义》、《诗经讲义》等著作。此外尚有陕西临潼人王巡泰,字岱宗,号零川,受业孙景烈门下,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山西五寨、广西兴业、陆川等县知县,所到之处皆有惠政,先后主讲临潼、渭南、华阴、望都、解州、运城,“多所成就,学舍或不能容”^⑥。著有《四书日记》、《格致内篇》、《仕学要言》、《河东盐政志》、《兴业县志》等十余种。因此时人称孙景

烈为关西夫子,海内大儒,“三秦学者翕然宗之”^⑦。

孙景烈一生除讲经授徒,著书立说,昌明关学外,还致力于家乡的文化事业,先后整理刻印康海的《对山集》,校注《武功县志》,还修纂了三部陕西地方志,在宣传陕西学人,宏扬陕西文化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整理乡贤康海的著作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合称“前七子”,著有诗文集《对山集》、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洧东乐府》,由其纂修的《武功县志》颇受时人推崇,被誉为关中名志。

康海《对山集》自明嘉靖以来凡六刻,各刻本所收篇目出入较大,孙景烈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整理刻印的《对山集》十卷本即其一。孙景烈所刻《对山集》共收策论一卷,书一卷,序二卷,记并杂著一卷,墓碑并墓表一卷,墓志、祭文、行状共二卷,诗赋二卷,此本与以前各刻本体例不同,采用文在前,诗赋在后的编排方式。孙景烈刻本除保留了嘉靖张太微刻本和万历马逸姿刻本所载各家序言外,还附有张治道、朱孟震、张光孝、杨一清、吕楠、崔铣、胡缙宗、李谦、王世贞、余宪、何良俊、张卤、王学谟、王九思、张文邦、钱谦益诸家及《明史》对康海诗文的评价。诸家评语后载马理所撰《对山先生墓志铭》,卷后又附武功人张洲乾隆二十六年所作《康对山先生文集后序》一篇。《四库全书总目》谓孙景烈所刻《对山集》系以嘉靖张太微本为底本“又加刊削而刻之”^⑧。韩结根先生研究认为,乾隆孙景烈刻本卷内篇目次序虽大体依嘉靖张太微校订本,但其中尚有序七篇,记五篇,墓碑二篇、墓志三篇,祭文一篇,赋二篇,四言古诗一首,五言古诗四首,七言古诗二首,五言律诗一首,七言律诗一首,五言绝句一首系出自

① 徐世昌编,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206《孙先生景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039页。

② 王巡泰《太史孙西峰先生文集序》,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

③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答王永寿居正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

④ 张宝树《太史孙西峰夫子文集后序》,孙景烈《滋树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

⑤ 赵尔巽《清史稿》卷340《王杰传》。

⑥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2,冯从吾《关学编》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页。

⑦ 王巡泰《太史孙西峰先生文集序》,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

⑧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71《集部·别集·对山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9页。

万历本而为嘉靖本所无,“所以乾隆十卷本实际是嘉靖本与万历本的合选本,而自成一系统”^[1]。四库馆臣认为《对山集》之嘉靖张太微本“珉珉燕石,间列错陈”,而万历马逸姿增刊本又“颇伤芜杂”,孙景烈刻本虽晚于嘉靖、万历刻本,“而去取谨严,于诗汰之尤力,较诸本特为完善,已尽海所长矣”^①。

孙景烈在整理刊刻康海《对山集》的同时,还校注并刻印了康海所纂《武功县志》。康海《武功县志》纂成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分三卷七篇,“凡山川、城郭、古迹、宅墓,皆括于地理。官署、学校、津梁、市集则归于建置。祠庙、寺观则总以祠祀。户口、物产则附于田赋。艺文则用《吴郡志》例,散附各条之下,以除冗滥。官师则善恶并著,以寓劝惩。”^②康海《武功县志》特色鲜明,文简事略,全书仅两万余字,向以文简事核而为世人称道,四库馆臣称“自明以来,关中舆记,惟康海《武功县志》与此志(《朝邑县志》)最为有名”^③。清初学者王士禛则曰:“以予所闻见,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志武功。”^④陈宏谋亦曰:“对山《武功志》文简事核,凡所纪载,悉关国计民生,人心风俗,确乎可传,可为志乘之极则。”^⑤同时,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史,尤其是清代史志学家对前人称誉有加的康海《武功县志》、朝邦靖《朝邑县志》多持否定态度。

康海《武功县志》自成书后屡经刊印,版本甚多,卷数也有三卷、四卷之别,加之此志乃人名志,自明正德十四年冯玮初刻本刊行后,“许多慕名者竞相刷印,尤其是历任知县官与当地缙绅们纷纷刷印,以之馈赠亲友上宪,视为‘礼货’。而刷印的频繁致使板片受损,字迹剥蚀,历经补板递修,正德初刻初印本极为罕见,后印本仅有极少数几本存世。而万历许国秀重刻本及清雍正沈华刻本也都是比较稀有了”^[2]。孙景烈对家乡先贤康海甚为崇拜,对其所修《武功县志》更是称赞有加,自称读康志数十年,爱之甚笃,称之为“实为明以来郡邑志中第一部书,亦为对山文中第一佳作”^⑥。鉴于《武功县志》原刻已不得见,“翻本多豕亥相淆”,多失本来面目,孙景烈于是着手校勘,“欲复先生之旧”,所用底本为张莱峰家藏善本,并与其他刻本参校,“爱正其讹谬,阙其所疑,而又以素所管窥者,妄加评点而略注之”^⑦。武功县知县玛星阿将孙景烈校注本予以刊刻,并在刻书序中说:“在籍太史孙西峰先生觅旧刻,细为校讎,正其谬,阙其疑,加之评注有年矣,而志之善乃益章焉。予求观之,遂付梓以公诸同好

者,当不徒取其文而遗其所载,视为饰轮辕之虚车也。”^⑧此刻一出,风行海内,甚是知名,并收入《四库全书》。孙景烈评注本在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均有重印、重刻,是康海《武功县志》中流传广、影响大的一个版本。

(二) 修纂陕西地方志

孙景烈校注康海《武功县志》并深受其修志体例的影响,在讲学之余,仿效康海《武功县志》之体例,纂修了《郃阳县志》和《鄂县新志》两部陕西方志,又搜集资料编纂《郃封闻见录》,为续修《武功县志》做准备,其在清代方志纂修历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孙景烈修纂郃阳志之前,郃阳旧志凡四修,分别是嘉靖二十年(1541)蔺世贤、魏廷揆纂修的《郃阳县志》二卷,万历二十年(1592)叶梦熊纂修《重修郃阳县志》七卷,顺治十年(1652)庄曾明、叶子循纂修的《续修郃阳县志》七卷,以及康熙四十九年(1710)钱万选纂修的《宰莘退食录》八卷。乾隆三十年(1765),席奉乾任郃阳知县,于为政之暇审阅郃阳旧志,嘉靖、万历志已不得见,《宰莘退食录》又未曾刻印,可见的最早志书乃顺治十年(1653)修成的《续修郃阳县志》,“迄今百有余年矣”。有鉴于此,身为地方父母官的席奉乾不得不将修志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但又不敢苟且从事,于是接受当地绅士的建议,聘请关中名士、武功人孙景烈纂修新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正月,孙景烈来到郃阳,着手修志,历时三个月即告完成。孙景烈所修《郃阳县全志》凡四卷七篇,首绘县境图一幅,卷一为地理、建置;卷二为田赋、官师;卷三为人物;卷四为选举、杂记。其体例与康海《武功县志》大同小异。当时郃阳人张松友在《新刻郃阳县全志序》中说:“先生讲学之余,尝评注《武功志》,以抉对山精蕴,为世所珍,则其洞然于志法者久矣。今于仲春来郃开馆纂修,阅三月书

①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71《集部·别集·对山集》。

②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武功县志》。

③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朝邑县志》。

④ 王士禛《蚕尾集》卷10《新城县新志序》,《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27册。

⑤ 康海纂,孙景烈评注《正德武功县志》卷首《诸家评语》,《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6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⑥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复陈榕门先生书(戊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

⑦ 孙景烈《滋树堂文集·新刊武功县志序(辛巳)》,《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7册。

⑧ 康海纂,孙景烈评注《正德武功县志》卷首玛星阿《新刊康对山先生武功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6册,第2页。按:此序系孙景烈代写,见《滋树堂文集》,第76页。

成,余受而读之,见其质文相丽,而脉络贯通,七篇直如一篇,至其叙事简明,立言醇正,皆本诸讲学心得者,盖以程朱之理为史汉之文,不独举对山、五泉两志之善兼而有之,且似过之也。三长并擅,五难无讥,吾邑之志,其自今足以征信而备輶轩之采矣乎。是则贤侯之盛举,太史之鸿裁,相与有成功,垂简册也。”^①

现存最早的户县方志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如璉、康弘祥纂修的《鄂县志》,此志是在明万历时人刘璞所修《鄂县志》的基础上增补订正而成,记事谨严,文字简炼,图文并茂,但是缺载两周史实及经籍志,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有续补,未曾刻印。雍正十年(1732),鲁一佐又再事增补,合前志一同刻印,是为雍正《鄂县重修续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汪以诚任鄂县知县,到任后即搜访王九思《鄂县志》准备重刻,虽然“悬重价购之,终不可得”^②,于是决定重修新志。当时适逢孙景烈主讲鄂县明道书院,孙景烈亦曾搜寻王九思的《鄂县志》而未果,鉴于孙景烈熟悉志法,评注过康海的《武功志》,又纂修过《郃阳志》,均颇得好评,是纂修新志的不二人选,汪以诚于是再三力邀,孙景烈以古稀之年不得已而任其事。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纂修工作,历时十月即告完成。志书修成后,孙景烈不甚满意,辞去明道书院讲席返回武功时,随身携带志稿,重新修改完善,然后寄回,并特意嘱咐汪以诚付梓前务必请陕西巡抚毕沅过目审定,其做事认真严谨,于此可见一斑。乾隆《鄂县新志》共六卷八篇十余万字,卷一地理;卷二建置;卷三田赋、官师、风俗;卷四、卷五人物;卷六选举、杂记。记事止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体例与孙景烈所修《郃阳县全志》大同小异,变《郃阳县全志》四卷七篇为六卷八篇,各篇名目、次序基本相同,仅增加了一篇风俗志,由此可见康海《武功县志》对孙景烈的影响之深。

孙景烈系武功郃封里人,郃封因后稷封郃作邑而得名。孙景烈晚年归乡闲居期间,一方面整理出版康海《武功县志》,纂修《郃阳县志》、《鄂县新志》,另一方面也广泛搜集资料,为续修武功县志做准备。为有别于历代官修的《武功县志》,孙景烈以居里名其书,称《郃封闻见录》。《郃封闻见录》效仿康海《武功县志》的体例,分为七篇,删去祠祀,而增加艺文。后人称《郃封闻见录》“地理篇考证独详,人物多依康氏志及续志、后志,所增加者仅数人。艺文未成篇,而征引繁富”^③。遗憾的是《郃封闻见录》未及完成,乾隆四十七年(1782)孙景烈辞世,未竟

稿亦佚于嘉庆年间,乾隆、嘉庆两朝武功县修纂志书,对孙景烈《郃封闻见录》多有参考。继康海《武功县志》后,康熙、雍正两朝武功均修有志书,孙景烈纂《郃封闻见录》时,武功县令钱君正着手修纂《武功县志》,未及完成,继任黄景略又聘请吴泰来继续修纂,增补付梓,于乾隆四十九年(1783)完成,从黄景略所作序言中看似未得见孙景烈所撰《郃封闻见录》。嘉庆年间,董教增巡抚陕西,偶然读到康海《武功县志》,“欲合三志(康熙、雍正、乾隆三志)续前志后,以便检阅,而未得其暇”。嘉庆十八年(1813),武功县令张树勋聘请罢官在家的延长县令王森文准备修志,董教增于是嘱其合纂续志,“依据三次递修旧志,参以乡先生孙检讨景烈所撰《郃封闻见录》,并绅耆采访新册合为一编,事无挂漏,而义例恪遵康氏”^④。《嘉庆武功县志》记事起于明嘉靖元年(1522),止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成书五卷七篇。

三、结语

孙景烈身为关学传人,继承了关学学者世代恪守的“躬行礼教为本”之宗旨,宣扬朱子之学,主张明体实用,知行合一,是颇有成就并受人敬重的关学学者,陕西督学杨梅似谓“关中一时人才济济,尤以先生为当世无双”^⑤。孙景烈一生不尚浮华,不务虚名,身体力行,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为己任,早在执教商州之始就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社会风气的改良,致仕后则以书院为阵地,以讲学授徒为手段,以昌明经学为目的,讲经传道,著书立说,“成就关中人才甚众”。不仅如此,孙景烈还热爱家乡,推崇先贤,先后整理出版了康海的《对山集》和《武功县志》,编纂志书《郃阳县全志》、《鄂县新志》、《郃封闻见录》,在宣传陕西学人、宏扬家乡文化方面做了贡献。总而言之,孙景烈是关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之一,在清代学术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下转第41页)

① 席奉乾修,孙景烈纂《乾隆郃阳县志》卷首张松友岩《序》,《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2册。

② 汪以诚《鄂县新志序》,汪以诚修、孙景烈纂《乾隆鄂县新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4册。

③ 转引自《陕西省志·著述志·古代部分》。

④ 董教增《续武功县志序》,张树勋修、王森文纂《嘉庆武功县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36册。

⑤ 王心敬《关学续编》卷2《西峰孙先生》,冯从吾撰,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页。